



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考辨(1920—1924)

□于国形*

摘要 文章对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书馆的创办、宗旨、章程、发展经过、藏书数量、藏书来源及藏书主题进行了史料梳理和史实考辨。并与同一时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通信图书馆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和新文化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北京大学 通信图书馆 无政府主义 区声白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3.015

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社团,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提倡和支持下,一时之间各种团体涌现,据统计,五四期间北京大学新成立的社团有60余个^[1-2]。

来自广东的区声白和黄凌霜信奉无政府主义^①,以“师复后觉者”自称,不仅积极参加有关社团活动,还于1920年7月7日在北京大学创设通信图书馆,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让有心求学者特别是工人团体有书可读。学术界对于1921年5月1日创立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通信图书馆”研究较多^[3-11],而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书馆”的相关文字,仅零散见于部分文章中^[12-14],尚且没有系统的论述。本文拟依托《北京大学日刊》《北大生活》等报刊中关于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的丰富材料,对其宗旨、章程、收藏图书及其发展经过进行梳理、介绍和考辨,以填补前人研究的空白,为研究者提供新的史实和参考。

1 通信图书馆的创办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然在名义上实行了民主共和制,可是随之而来的军阀专政、尊孔复古,使得

满怀期待的青年们内心积郁愤懑,他们意识到要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根本的改造。于是,一场以宣传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应时而起,其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他们逐渐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出路^[15]。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向来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在五四期间以各种主义为宗旨的社团迭起。这其中就包括无政府主义社团。

据《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记载,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有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影响了一些寻找革命出路的青年学生^{[12](47)}。然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过数十人,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区声白、黄凌霜为首,信奉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出版小册子《实社自由录》,并设立了一个通信图书馆;另一派以朱谦之为首,赞成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印了小册子《奋斗》^{[12](47)}。

所谓“无政府主义”,可以理解为“没有统治者”,1848年之后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主要理论家包括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16](210)}。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所有的人自愿联合^{[16](211)}。实现这

* 于国形,邮箱:shdyugt@163.com。

① 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传入时期,1902—1905年,高潮是在1903年“苏报”案前后。第二个时期是形成和发展时期,1906—1920年。这一时期又可以细化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末年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初步成熟,以“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为代表;第二阶段是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形态,师复主义(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信奉克鲁泡特金的学说;第三阶段是五四前后师复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区声白和黄凌霜等人继承了师复的意志。第三时期为衰退时期,1921—1949年。参见: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5-6。



一目标的消极条件是用武力摧毁或者无视手段彻底摧毁国家;积极条件是在旧的社会中逐步建立新的社会,所用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都将预示着所追求的自由联合体^{[16](211)}。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蒲鲁东以及其他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70和80年代,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援引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关系的批判中又发展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90年代之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再度分道扬镳^{[16](210—216)}。

如前文所述,寻找革命出路的青年也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的各种思潮中,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负面的,而是属于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记载,1919年秋,国内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风行一时^{[17](252)}。1919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其成员后来也发生了分化,成立了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组织,包括郭梦良、朱谦之等人成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会”,陈顾远等人成立的“工团主义研究会”,瞿秋白等人成立的“无政府主义研究会”等^{[17](253)}。此外,邓中夏于1921年12月初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确定的研究题目有:“马克思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扎维克’、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运动之现况、社会党与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德漠克拉西’与社会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义^[18]。”可以发现,“无政府主义”也名列研究题目之中,表明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也把无政府主义看作社会主义流派。

1920年7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通信图书馆”的第一个启事:本馆现已开办,新到英文书籍十二种,及中文书籍甚多,无论本校同学或校外一般的劳动者,皆可按照本馆章程,备保证金来借阅,本馆十分欢迎^[19]。

可见,最迟至1920年7月7日,区声白、黄凌霜等人即已创立了通信图书馆。需要说明的是,通信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第一个启事称为《通讯图书馆启事》,内有“本馆很欢迎各位热心的先生们捐助书籍”“无论本校同学或校外劳动者,皆可按照本馆章程、备保证金来借阅”^[19]等字样,而后紧跟着登载《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和《通信图书馆章

程》,且《通讯图书馆启事》和《通信图书馆章程》里陈述的馆址都落座在“北京大学第一院”^[19,22]内,故此推断该图书馆存在“通讯图书馆”与“通信图书馆”名称混用的情况。7月8日第一版又出现同样的混用现象。“通讯图书馆”名称最后出现于1920年7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的《通讯图书馆鸣谢启事》,此后全用“通信图书馆”这一名称。1920年代上海的通信图书馆有时也称为“通讯图书馆”,可见当时“通信图书馆”与“通讯图书馆”经常混用。为方便叙述,本文统一称为“通信图书馆”。

区声白和黄凌霜一派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无论校内同学或校外劳动者都应有读书的机会,这是他们的办馆主旨。区声白和黄凌霜等人在后来的《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中明确指出:“近日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但是改造社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我们必要使人人均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新知识、新学说^[20]。”他们认为当今社会的工人是社会改造的主体,人类能够生存,全仰赖工人之力,若想援助工人,“最好是增进他们的智识,使他们能自己觉悟^[20]。”但如今私产制社会,知识和财富都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各人之财力有限,有心阅读的人也为金钱所限,虽欲研究但苦于无书可读。故而通信图书馆的创办者认为,“通信的方法轮流借阅,想亦是促进文化最良好之工具^[20]。”综上,通信图书馆的宗旨在于以“通信的方法”借阅流通图书,为受经济条件限制的青年学生和劳动者提供读书的机会,使他们接受新知识、新学说,提高觉悟,参与社会改造。

何谓“通信的方法”?“通信”二字是为图书流通采取通信邮借的方式,所以“通信图书馆”是通过邮寄方式向读者借书,使各阶层读者,能够不再受到时间、地域的限制,以很少的费用借阅好书,这也正是“通信图书馆”与一般图书馆的主要区别所在^[11]。因为民国时期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图书的数量都相对有限,距离图书馆较远的读者往来阅书不便,鉴于此,一些有识之士开设通信图书馆。读者在获得通信图书馆借阅资格后,以书信往来的方式将欲借之书告知图书馆,图书馆将书邮寄给读者,读者在一定阅读期限内阅毕再邮还图书馆。相对于一般图书馆,通信图书馆的优势在于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使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和时间都得以扩展^[21]。

2 通信图书馆的章程

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通过募捐的方式获得大



量图书和部分资金,读者无论校内外人士,只要交纳借书保证金和邮费,均可以“通信”的方式借阅。为确保通信图书馆的有效运行,该馆在成立之初就公布了比较详细明确的章程。

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通信图书馆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共有十条。

一 本社利用通信之方法,使各地方之有志读书者,得以很少的金钱,阅览多数的书报为宗旨。

二 本馆编有图书目录,按人分赠一份,新到书籍、每月对于阅书者报告一次。

三 阅书者须先交保证金若干元,至不阅时除租借费外余数归还。但不到一年者,不得取回保证金。

四 所借书籍之价值,不得超出保证金以外。

五 借书者须照书价按月纳费百分之五,邮费在外。

六 阅书者知有新出书籍,为本馆所无者,可以随时通知本馆酌量购置。

七 借出书籍,如有遗失或损坏时,须酌量赔偿。

八 书籍送还时,须在邮局挂号,如有遗失归阅者负责。

九 阅书者对于书籍的内容,若有不能了解者,可随时提出质问,本馆负答复之责任。

十 本馆的地址:北京大学第一院傅佐。^[22]

以上条款首先明确提出该馆的宗旨所在,可见通信图书馆是汇集众人的力量,使参与者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得较多的书籍阅读,为有志读书者提供方便。《章程》主要规定了通信图书馆的借书规则:首先,凡借书者皆须交保证金,保证金以一年为最小单位,至还书时除租借费外之余数归还,借书之价值需在保证金之内;其次,借书者需要按照书目价值按月缴纳5%的借阅费;再次,书籍送还时,须在邮局寄挂号信;最后,借出书籍如有损坏,须酌情赔偿。除此之外,读者若想阅读本馆尚未购入之新书,可随时通知图书馆酌量购置。可以说,《章程》对于借阅的各个环节考虑得比较周全。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书馆”不采取会员制模式,缴纳保证金之后一切人士皆可前来借阅,这与同时期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馆“亢慕义斋”和上海“通信图书馆”的

经营模式不同。后两者均系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其经营方式不仅采取会员模式,而且入会需要具有共同的研究兴趣或思想倾向。

3 通信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3.1 藏书数量

1920年7月7日,通信图书馆刚创办时仅有中文书籍若干和英文书籍12册^[19]。有感于书刊的匮乏和资金的短缺,同日,区声白等人发布《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20],呼吁北京大学同人捐助。三日后,获赠中西文图书122册,中西文杂志22册,现洋54元。其后又经过四次募捐,获赠中西文图书55册,中西文杂志114册,现洋6.5元。除了接受募捐外,通信图书馆还以募捐所得购入新书籍,7月20日,新购入图书报刊68册,其中西文书籍15册,中文书籍4册,中文杂志49册^[24-29]。经过近半个月的努力,馆藏图书报刊已累计450余册,通信图书馆初具规模。

在此基础上,同年7月24日,通信图书馆正式公布藏书主题及收集渠道,“本馆征求凡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及劳工问题、妇女问题等类书籍,无论中文西文,皆所欢迎,愿以下列三种方法得之:1.赠送本馆的;2.卖与本馆的;3.以书名及购买的地方告诉本馆的^[30]。”此后近半年间,通信图书馆以上述三种渠道收藏图书报刊150余册^[31-38],至1920年底,馆藏书目总计600余册。期间,图书馆还曾于10月4日编订图书目录^[39]。1920年11月26日,通信图书馆因主持乏人,陷入停办。三年半后,1924年4月2日,通信图书馆筹备复馆事宜,再次开馆^[40]。复馆后的通信图书馆又添增图书报刊600余册^[41-60]。

根据以上《北京大学日刊》材料所载,通信图书馆至闭馆之日,共筹集资金60.5元,馆藏图书1300余册,在社团图书馆中,规模不算小。与同时期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藏书室“亢慕义斋”相比,就筹集资金情况看,尚有一定差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馆伊始即筹到资金120元^[23],是通信图书馆的两倍。就图书馆藏来源看,“亢慕义斋”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很多图书都是由其转来或代购的,而通信图书馆从目前资料看,似乎得到的相应支持较少^[61]。藏书数量方面,据相关资料,“亢慕义斋”在1922年12月时馆藏书籍仅有数百部,与通信图书馆存在较大差距^[62]。究其原因,可能“亢慕义斋”属



于更专门的图书室,收藏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文献,而通信图书馆读者面和收藏范围较广。

3.2 图书来源

图书馆刚成立时,限于资金人力,主要靠募捐,为此,通信图书馆特意发布《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务望热心诸君,或惠赠书籍,或慨助金钱,这都是大众所最感谢的^[20]。”可见,通信图书馆的馆藏来源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图书捐赠,一种是募捐资金后购买。通信图书馆馆藏图书 1300 余册,其中来自捐赠的图书数量有近 1200 册,占全部图书数量的 92%,而通过筹集资金购入的图书仅有 100 余册,占 8%左右。下面我们对占 92%的直接捐赠图书的情况进行考察,分析这些馆藏的来源。

(1) 北京大学同人的捐助

创始人区声白除了为图书馆事业奔走外,还以身作则,积极捐款捐书,是捐书数量最多者,共计捐赠 108 册,占捐赠图书总量的 9%。区声白所捐 108 册图书中有 62 册与“世界语”有关。“世界语”即“Esperanto”,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在 1887 年发明的一种国际辅助语言,初衷是希望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和谐共处。因此,世界语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追捧。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刘师复以及蔡元培都曾积极宣传世界语。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于 1922 年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推荐,聘请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任北京大学世界语讲师,周作人不仅多次担任爱罗先珂的翻译,还曾亲自讲授世界语,当时的北京大学堪称中国北方推广世界语的中心。区声白捐赠的大量世界语图书,也是当时北京大学学习世界语风气的一种反映。

除此之外,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大力支持通信图书馆,共捐赠现洋 10 元^[24],图书 34 册^[57]。蔡元培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启蒙者,曾鼓吹过暗杀革命,提倡互助论,与“天义派”和“新世纪派”都有往来^[63]。1904 年,蔡元培还发表《新年梦》一文,宣传“虚无党”革命事迹,渴望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世界^[64]。这里的“虚无”,实际就是指“无政府主义”。可见蔡元培本身就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对此,周作人也表示认可^[65]。尽管被当代学者指称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蔡元培却是以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为学界所知,这正体现了中国早期社会思想流派的混杂性以及思想来源的复杂性^[66]。

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向来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著称,除了以上无政府主义人物对通信图书馆的支持外,也有不少思想主张各异的社会名流积极为通信图书馆捐赠图书。这些社会名流中以北京大学教员和学生为多。其中较为著名者有:①北京大学教授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徐宝璜、北京大学学生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何邦瑞,分别捐赠图书刊物 76 册^[24]、22 册^[26]。②新潮社发起人、少年中国学会主要成员徐彦之,共赠图书 66 册^[36,67],其中 58 册为徐氏即将离校时赠送^[68]。③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捐赠图书 2 册^[26]。④ 1930 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捐赠图书 3 册^[28]。⑤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捐赠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1 册^[32]。⑥北京大学讲师、著名学者梁漱溟捐赠其所著《唯识述义》1 册^[69]。⑦五四时期旁听过鲁迅课程的著名小说家王鲁彦捐赠图书 46 册^[3,44]。由上可见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同人间的思想交流和互帮互助。

(2) 社会团体和出版媒介的捐助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思想文化的中心,学校以外的社会团体和出版媒介也都对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投以关注,予以支持。

通信图书馆于 1920 年 8 月 7 日获上海中华书局赠《中华教育界》2 册^[32],8 月 26 日获家庭研究社赠《家庭研究》1 册^[35],11 月 8 日获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体赠日本书籍 6 册^[67]。至 1920 年底通信图书馆停办时,来自社会团体和出版机构的赠书共计 9 册。

1924 年 4 月 3 日通信图书馆再次开馆后,来自社会方面的赠书数量明显较 1920 年为多,共 70 册。新开馆后的通信图书馆获得最多的捐赠来自平平旬刊社,自 1924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8 日间,该社捐赠《平平旬刊》第三、四、五、六、七期各 10 册,共计 50 册^[51,55,57-58]《平平旬刊》由彭英华、蔡炳耀、许乃昌等人在 1924 年 4 月创刊于上海,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宗旨,与全国各界无政府主义者保持联络。除此之外,通信图书馆还得到其他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捐赠,例如自由社的《自由人》刊物 3 册^[41],安那其学说研究会的英文书籍 4 册^[54]。除无政府团体外,通信图书馆还得到一些报社、社团和出版社的捐赠,如北京大学影剧周报社赠送《影剧》周报第一、二、三号各 1 册和第四号 2 册^[59-60],新闻学研究会赠送王解生著《新闻纸改造》1 册^[41],青年文艺社赠



送《威尼思商人》(今译威尼斯)1册等^[58]。这些关于电影、莎士比亚戏剧等方面的赠书丰富了通信图书馆藏书的种类。

3.3 图书种类

上文讨论了作为馆藏图书主要来源的捐赠图书。本节重在剖析通信图书馆花费资金购入的图书。通过对通信图书馆自购图书的考察,来分析通信图书馆在自主选购图书时所体现的思想倾向。

1920年7月24日,通信图书馆刊登征书启事:本馆征求凡关于 Socialism、Anarchism、Syndicalism(应为 Syndicalism 之误),Bolshevikism(应为 Bolshevikism 之误)及 Labour Problem, Woman Problem 等类书籍,无论中文西文,皆所欢迎^[30]。由征书启事可知,通信图书馆在图书收集方面有非常明确的主题和倾向性,即以各种社会主义图书为主,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除此之外,劳工问题和妇女问题也是其关注的重点。可见,当时的社会主义社团虽然分成多种派别,但是他们所研究的“主义”却不是那么壁垒森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有不少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第四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刊登有该学会的藏书目录,并做了简单的主题分类。笔者将《北京大学日刊》《通信图书馆启事》中刊登的该馆自行购买的图书目录相对照,发现“亢慕义斋”与通信图书馆在收藏主题上有颇多相似之处,而且个别图书两者都有收藏,也有同一种书的不同语言版本。这里略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相关主题对通信图书馆这些自购书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以揭示通信图书馆主持者在购买图书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以及当时相关社团对一些“主义”和问题的共同关注。

3.3.1 社会主义

(1) 科学社会主义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19],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的书目中包括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 其中 Scien. 应为 Scientific 的缩写。本书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丽英女士”(柯柏年笔名)译, Engels 著者译为昂格思, 书名译为《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 连载于《觉悟》(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1925年2月19—21日, 24日, 26—27日, 3月3日, 5—7日、10日、12—13日。

(2) 无政府主义

师复:《安那其主义讨论集》^[37]。师复,即刘师复,原名刘绍彬,又名刘思复,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安那其”为“无政府主义”的英文 Anarchist 的音译。

Motler: *Anarchist Communism* (《无政府共产主义》)^[28]。作者莱纳德·奥古斯丁·莫特勒(Leonard Augustien Motler)(1888—1967),英国无政府主义者,聋哑人,一战反对者。

无政府主义社团民生社:《工人宝鉴》^[28]。无政府主义社团民生社1919年出版的《工人宝鉴》,正文前有《无政府主义总纲目》,作为序言,正文包括溥泉(张继)翻译的罗勒(A. Roller)的《总同盟罢工》和信者翻译的拉马铁达(Ramateda)的《工人之无政府主义谈》。

(3) 国家社会主义

Walling and Laidler: *State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19]。编者威廉·英格利希·沃林(William English Walling)(1877—1936),美国社会主义者,社会活动家,百万富翁。著有 *Socialism as It Is—A Survey of the World—Wid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Larger Aspects of Socialism; Russia's Message: the People Against the Czar* 等。合编者哈里·惠灵顿·雷岱尔(Harry Wellington Laidler)(1884—1970),美国社会主义者、作家、编辑,曾任美国“争取工业民主联盟”执行主席,著有或编辑关于社会主义和经济问题的图书或小册子50余种,包括 *Boycotts and the Labor Struggle, History of Socialism* 等。本书全名为: *State Socialism, Pro. and Con.; Official Documents and Other Authoritative Selections Showing the World-Wide Replacement of Private by Governmental Industry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4) 费边主义

Pease: *The History of the Tabian Society* (《费边社历史》)^[19]。其中, Tabian 应为 Fabian 之误。作者爱德华·雷诺斯·皮斯(Edward Reynolds Pease)(1857—1955),英国作家,费边社创始人之一,1890—1913年任费边社书记。

(5) 基尔特社会主义

A. R. Orage: *National Guilds* (《国家基尔特》)^[28]。本书全名 *National Guilds: an Inquiry into the Wage System and a Way Out*, 实际上是奥



拉奇编辑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家霍布森的文集。编者阿尔弗雷德·理查德·奥拉奇(Alfred Richard Orage)(1873—1934),英国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现代主义文化方面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以编辑《新时代》(*New Age*)而闻名^[70]。

Hobson: *Guild Principles in War and Peace* (《战时与平时基尔特原理》)^[19]。作者塞缪尔·乔治·霍布森(Samuel George Hobson)(1870—1940),生于北爱尔兰,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家,费边社早期成员,并曾任费边社总裁。“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词为Hobson于1914年创造,他后来帮助创立英国国家基尔特联盟。

(6) 社会主义史及其他

Macdonald: *Socialism After the War* (《战后社会主义》), Macdonald: *The Socialism Movement* (《社会主义运动》)^[19]。作者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参与创立工党,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新青年社编辑部编:《社会主义讨论集》^[29]。讨论集里收集了发表于《新青年》的26篇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文章,如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李达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施存统的《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以及许兴凯的《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

3.3.2 劳动(劳工)问题

Cole: *The World of Labour* (《劳工世界》), Cole: *Self Government in Industry* (《工业自治》)^[19]。作者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柯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1889—1959),英国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家、费边社成员。前者图书全名为: *The World of Labour: A Discussion of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rade Unionism*。Cole著作丰富,除上述两种,还有 *An Introduction to Trade Unionism*, *Guild Socialism—A Plan for Economic Democracy*, *Trade Unionism and Munitions* 等。

3.3.3 俄国问题

Lenin: *The Soviets at Work* (《劳农会之建设》)^[19]。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的书目中有中译本,应为李立翻译,192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列宁全书”丛书^[71]。

Trotsky: *The Bolsheiki and World Peace* (《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19],其中Bolsheiki应

为Bolshevik之误,作者托洛茨基。1922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中译本,译名为《多数党与世界和平》。

Spargo: *The Psychology of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心理学》)^[19]。作者斯巴戈·约翰(Spargo John)(1876—1966),美国社会主义学家、改革家、博物馆馆长。他的图书被翻译成中文的有《俄国革命祖母布罗斯谷夫斯加传》《俄罗斯大风潮》等。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通信图书馆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藏书室“亢慕义斋”虽然具体收藏图书因为年代等原因差别较大,但是在大的主题方面,都包括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和俄国问题,表现出较高的相似度。通信图书馆关于社会主义的馆藏图书方面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1)通信图书馆所购图书不仅仅局限于无政府主义,还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不同社会主义流派,此外还有与俄国革命、劳工问题相关的图书,以及当时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集。这正体现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流派的驳杂性以及思想来源的复杂性,前述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研究题目也具有类似的特点。(2)通信图书馆馆藏图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重叠部分。同样作为北京大学的机构或团体,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图书的交流互动或彼此借鉴。(3)通信图书馆当时购入的英文版社会主义书籍尚无完整的中译本。其后一些国内中译本的底本也有来自通信图书馆的可能。(4)通信图书馆大多数关于社会主义的图书都只有英文版本,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之日就筹集了现银120元,购买了英德法三种语言的马克思全集各一份,且收集了部分中译本。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所公布的书目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收藏的社会主义著作基本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更为纯粹,两团体在此方面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23]。

4 通信图书馆的发展

通信图书馆约在1920年7月7日成立,馆址暂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二层新闻研究会内^[22]。先后遭遇两次停办,最终于1924年秋销声匿迹。

4.1 通信图书馆迁馆与第一次停办

1920年9月24日,通信图书馆发布启事,暂停营业,“本馆现在因要迁移及开课在即,暂行停止办公时间,待将来迁妥及另定时间,再行通告^[72]。”



1920年10月4日,通信图书馆迁馆完成,新地址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内(即第一寄宿舍字字号内),迁馆后的图书馆开始着手编定图书目录^[39]。

4.2 通信图书馆主办人物出国与第二次停办

翻检《北京大学日刊》,笔者发现,1920年11月26日至1924年4月3日间,通信图书馆没有刊登过任何消息。1924年4月3日通信图书馆发布《通信图书馆启事》,宣告图书馆恢复开馆,其后的4月4日、7日、8日、9日重申该启事。该启事称:“本馆前以主持乏人,致陷停顿,现经筹备复活事宜就绪,凡先者借阅诸君,务祈于四月十号以前,将书籍赐还第二院本办公室,无任诚感,嗣后阅览,须照现行新则,此启^[40]。”原来,通信图书馆前因主持乏人,陷于停顿。通信图书馆由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和黄凌霜发起创办。核心人物为区声白。区声白于1921年赴法留学,就读于里昂大学,在法国期间加入了国际性世界语组织“全世界无民族协会”,1925年回国。黄凌霜约于1922年赴美留学,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73]。可见,骨干力量的离开使得通信图书馆一时之间陷入停顿,时间长达3年半。

4.3 通信图书馆销声匿迹

1924年8月30日,通信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最后一条启事用以鸣谢赠书,此后,再无消息。关于通信图书馆停办的原因至今不明,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寻求解答。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面对中国走向何处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1924年国民党二大听从苏联的意见,进行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实现合作进行北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革命高潮,无数进步青年都为这一潮流吸引纷纷加入革命。而无政府主义则因为缺少组织性,仅凭青年的一腔热血不足以撼动旧制度,建设新秩序,在历史潮流中逐渐衰退^[74]。以通信图书馆两位发起人为例,黄凌霜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出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脱离了无政府主义队伍。区声白1926年回国后,主要在广州从事世界语推广工作,1931年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传委员会从事国际宣传工作。由此可以推测,通信图书馆的销声匿迹与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衰退有关。

5 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很多社

团,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通信图书馆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以区声白和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创办通信图书馆,帮扶工人团体,让有心求学者有书可读,宣传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内的新学说、新知识。

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相比,通信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虽然较大,但其历史影响远不及“亢慕义斋”,这也是通信图书馆一直被人忽略的主要原因。虽然如此,通信图书馆公开征求、购买有关社会主义及俄国问题、劳工问题和妇女问题等方面的图书,与“亢慕义斋”的收藏主题和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的研究问题又有很多相似重合之处,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主义、思潮交流互动的历史面貌,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革命者在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寻找救国真理并最终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脉络。

通信图书馆收集和借阅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俄国问题和工人问题相关著作,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在传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新思想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通信图书馆陪伴了北京大学四载春秋,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和新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通信图书馆作为一种独特的图书馆经营模式,其创立、募集和经营的历史,也应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 1 王学珍,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 王学珍,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 谢灼华. 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J].图书馆学通讯,1960(5):24—27.
- 4 李克西. 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创始者——应修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0(4):3—4.
- 5 卢中岳. 楼适夷与上海通信图书馆[J].图书馆学研究,1982(6):101—102.
- 6 孙继林. 上海通信图书馆史料一则[J].图书馆杂志,1984(3):75.
- 7 孟昭晋. 上海通信图书馆[J].国家图书馆学刊,1988(3):61.
- 8 刘聪. 应修人与上海通信图书馆[J].时代教育,2015(5):164.
- 9 小谷一郎,王建华. 三得里的“小伙伴”——创造社出版部和上海通信图书馆[J].上海鲁迅研究,2016(1):205—229.
- 10 高然. 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6):78—83.
- 11 郑爽. 会员制模式在民国私立图书馆的运用——以上海通信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5):19—27.
- 12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 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M].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47.
- 13 予文. 五四运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J].图书馆学通讯,1989(2):36—39.



- 14 邹新明,陈建龙.从北京大学图书馆《1919—1920年西文图书登录簿》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5):5—11.
- 15 张允侯.五四时期的社团(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
- 16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哥.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M].俞可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张静,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 18 杨军.邓中夏思想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41.
- 19 通讯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7-7(1).
- 20 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7-7(1-2).
- 21 王昭.民国时期图书馆馆外读者服务概述[J].图书馆界,2013(5):38—41.
- 22 通信图书馆章程[N].北京大学日报,1920-7-7(2).
- 23 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1-11-17(4).
- 24 通讯图书馆鸣谢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7-10(1).
- 25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二)[N].北京大学日报,1920-7-13(1).
- 26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三)[N].北京大学日报,1920-7-15(1).
- 27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四)[N].北京大学日报,1920-7-17(1).
- 28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五)[N].北京大学日报,1920-7-20(1).
- 29 通信图书馆新到书籍表(第二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0-7-12(4).
- 30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7-24(1).
- 31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六)[N].北京大学日报,1920-7-31(1).
- 32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七)[N].北京大学日报,1920-8-7(1).
- 33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八)[N].北京大学日报,1920-8-12(4).
- 34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九)[N].北京大学日报,1920-8-14(4).
- 35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十)[N].北京大学日报,1920-8-26(1).
- 36 通信图书馆鸣谢启事(十一)[N].北京大学日报,1920-9-4(1).
- 37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9-16(1).
- 38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9-23(2).
- 39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10-6(1).
- 40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4-4-3(3).
- 41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二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4-15(3).
- 42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三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4-15(3).
- 43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五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4-22(4).
- 44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六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4-23(3).
- 45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七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4-24(3).
- 46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八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4-24(3).
- 47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九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2(3).
- 48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2(3).
- 49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一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2(3).
- 50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二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3(3).
- 51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三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6(3).
- 52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四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9(3).
- 53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五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14(3).
- 54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六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16(3).
- 55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七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5-27(3).
- 56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八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6-9(3).
- 57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十九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6-14(3).
- 58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二十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6-28(4).
- 59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二十一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7-12(4).
- 60 通信图书馆启事(第二十二号)[N].北京大学日报,1924-8-30(3).
- 61 吴晞.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2):38—44.
- 62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2-12-13(3).
- 63 付建舟.蔡元培与无政府主义思想[J].兰州学刊,2006(9):40—41.
-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五四运动回忆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85.
- 65 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491.
- 66 朱军.早期社会主义文学想象的儒学渊源——以蔡元培和《新年梦》为中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29—136.
- 67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11-8(1).
- 68 徐彦之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9-4(1).
- 69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10-28(2).
- 70 昔尘.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J].东方杂志,1920(15):53—58.
- 71 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J].1921(5):124.
- 72 通信图书馆启事[N].北京大学日报,1920-9-24(1).
- 73 李帆.民国思想文丛(无政府主义派)[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105.
- 74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281—285.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23年1月14日

修回日期:2023年3月29日

(责任编辑:支娟)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1920—1924)

Yu Guot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stablishment, purpose, constitu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collection quantity, collection source, and collection theme of the Communication Library, an anarchist associ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conducts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It also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Marx The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the Social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the Youth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points out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Library in disseminating socialism ideological trends and new culture.

Keywords: Peking University; Communication Library; Anarchism; Ou Shengbai; Marx Theory Research Association